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中国农业科学院 編
农业经济研究所

农业出版社



人民公社集体經濟的优越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經濟研究所編

农 业 出 版 社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老钱局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4144.182

1963 年 12 月北京制型

1963 年 12 月初版

1964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9,000 册

开本 850×1168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四又八分之五

定价 (4) 三角七分

出版者的話

这是一本材料书。是我国农民响应党和毛主席“組織起来”的号召，由互助組、合作社走向人民公社的光輝历程。

本书收录的十一篇調查报告，通过具体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而且在經濟上，由于坚决走集体化道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彻底改变了解放前那种逃荒、討飯、卖儿、鬻女的悲惨生活，踏上了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必須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总结斗争經驗，以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溯往可以知来，我們出版这本記錄了我国广大农村刚刚走过的一段路程的小册子，謹供农村工作的同志們参考。

目 录

走上幸福道路	1
十九年間	21
第十个秋天	36
徂徕山下的一面紅旗	53
回想办社那一年	72
看愚公怎样移山	81
在斗争中前进	99
八項事实	113
为农业技术改革开拓了道路	120
飞沙窝巨变	130
涝洼地区的繁荣	138

走上幸福道路

——东郭大队集体经济的調查

“这个土地改革以前十分穷困的佃戶村，1955年大多数人还是由国家供应口粮，如今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基础，集体的劳动創造了这个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也創造了新的共同富裕的生活。”

一个拥有一千多人、四个生产队、近两千亩薄地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通过集体化的道路，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能够把社員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山东曲阜县陵城公社东郭大队几年来的变化給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回答。这个土地改革以前十分穷困的佃戶村，1955年以前大多数人还要由国家供应口粮，如今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基础，集体的劳动創造了这个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也創造了新的共同富裕的生活。

走出孔子故乡——曲阜县城，向东南十五里就是东郭村。全村二百十七戶，土地一千七百八十二亩（解放时其中70%以上是沙土地），人口一千零三十人，整半劳动力四百六十八人，每人平均有地一亩七分七厘，每个劳力平均負担耕地面积三亩六分。主要作

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甘薯、大豆等。1948年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1954年建立了初级社，1955年冬季成立高级社，1958年秋季人民公社成立，东郭村高级社成为陵城公社一个大队。

集体经济发展的几笔帐

以下是这个村的一些数字调查。

粮食 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七十七万九千五百零六斤。粮田平均每亩产量六百一十斤(其中甘薯四斤折合粮食一斤，薯田面积约占三分之一)。1957年总产量为五十二万四千二百一十斤，粮田亩产量为四百零五斤。1949年亩产量只有一百五十多斤。1962年小麦平均亩产二百八十斤，比1961年每亩增产一百斤。秋收尚未结束，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961年。

蔬菜 1961年生产马铃薯、大头菜、胡萝卜等二百一十万斤。花生三万斤。1955年初级社的时候，蔬菜产量只有十万斤。

耕畜 全大队共有骡、马、牛、驴一百一十七头(包括幼畜和已卖出的十九头)。1957年有六十头，1949年三十六头。马和骡子是在公社化后才有的。

猪 全大队现有大小猪一千八百六十六头，每户平均八头半左右。1957年，全村有猪二百二十头，1949年仅有二十四头。

基本建设 现有砖、石、灰井八十三眼，机井十二眼，解放式水车五十二部，抽水机十部(共九十七点五马力)。1949年没有一亩水地，全村只有五眼吃水用的石井。

全村九百六十四间房屋，其中四百十六间是公社化以来新盖的瓦房，八十户社员住了新房。

每个生产队都有粉坊，大队正在修建的有油坊、豆腐坊。

大队有铁、木工组各一个，砖瓦窑、石灰窑各一座，理发室一处，代销店一处。

物质文化生活 社員生活水平逐年上升。1959、1960年两年每人人口粮为五百斤，1961年蔬菜面积扩大，社員口粮为四百九十六斤，1962年减少了一部分菜田面积，社員口粮預計达到六百斤，每人已分麦子一百一十二斤，早秋粮正在分。油、菜、副食等一般按基本口粮等級或工分分配。平均計算，1961年每人分配菜三百三十斤（1962年仍維持这个水平，不足部分由社員按低于牌价30%的价格到大队的菜园去买），食油五斤，肉三斤，粉皮粉条五斤，姜一斤，花生四斤，苧、麻共一斤，烟叶（按烟袋分）十二斤。社員每月可以按工分預分一定数量的錢，最高的每月十一元，最低的五、六元。1961年每人平均收入現金一百二十五元。社員的家庭副业收入，仅猪一項，每人平均四十元左右。

大队設有民办小学一座（共五个班級），一百六十多名适龄儿童絕大部分上了学；全队在学的初中生十四人，高中生两人。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有二十六人，初中毕业生十三人。大队設有保健站一处，有西医两人，中医一人。

交售粮食 这个大队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是十二万四千斤，其中小麦征购任务四万八千斤，完成十万斤，超額一倍以上。还卖给国家馬鈴薯二十四万斤。从1956年至1961年，这个历来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大队，共交售給国家粮食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五百斤，約占总产量的26%。从1958年以来折价帮助穷队的物资有：甘薯种子二十万斤，甘薯秧子三百万棵，牛草八万斤，耕牛三十七头。

国家的支援 1956年至1961年，国家卖给这个大队化肥十三万斤，农药二万四千六百斤，煤炭二百零四万斤，民用煤油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一斤，抽水机十部，解放式水車五十二部，胶輪大車八辆，胶輪小車四十八辆，双鋒犁三部，噴霧器、噴粉器十二部，蒙古馬五匹，泗水牛二十八头。生活用品的供应包括自行車、縫紉机、汽灯等。1962年，这个大队多交售給国家小麦五万二千斤，国家額外供应他們化学肥料五万斤。

和小农經濟作个比較

集体經濟給东郭村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生活。可是，这种富裕的程度比本村过去的富裕中农的生产、生活水平怎样呢？

讓我們举这个村一户生产、生活水平最高的富裕中农郭守均来作一番比較。郭守均，1946 年的經濟状况是这样的：全家九口人，有劳力两人（平时雇用一部分短工），土地五十四亩，全年收粮八千一百斤，除交公粮，扣飼料粮、种子粮，生产投資粮外，剩下的口粮約三千斤，每人全年平均吃粮三百三十斤。現在全村每人平均口粮五百斤左右。这一家九口人当时住房七間，平均每人不足一間。現在全村有房九百六十四間，住房稍多于他家。这一家当时有被子四床，平均两个多人有被子一床。現在，全村一千零三十人有被子八百床，四个人大約有被子三床。这一家当时养猪一头，現在全村每户平均养猪一头半（仔猪不計在內）。这一家过去每年吃油二十七斤，每人平均三斤，現在全村每年每人吃油达到五斤。这一户当时有学龄儿童五人，其中上学讀書的二人，現在全村适龄儿童基本上都上学了。全村每户都有暖水瓶，每人都有一双雨鞋或球鞋，而郭守均家当时是沒有这些东西的。

解放前，占 80% 的下中农和貧雇农平均只有五分地，他們遭受地主的残酷剝削。1926 年至 1928 年三年間，东郭村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庄稼沒有收成。全村关門逃荒的有二十家，逃荒死在外地仅知名的就有三十四人。三年的灾荒，使得全村二十七戶貧农失去了土地，下降为佃农；十三戶中农下降为貧雇农，全村十八戶为生活所迫，卖出了自己的儿女。解放后，在合作化以前，个体农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在經濟上仍然是无法摆脱貧困的。1955 年这个村有九十七戶缺粮，全年依靠国家供应粮食二万一千五百斤。

农业合作化宣告了小农经济的结束。从1956年起,这个村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最穷苦的贫农郭守元,原来六口人,四亩半地。他的父亲给地主打长工,最后饿死了,自己八岁时给地主割草,母亲领着弟妹讨饭。他家现有六口人,五个劳力,住有四间新屋,1961年每人全年平均口粮达到六百斤。全年收入现金一千二百元,养肥猪两头,收入一百三十元。全家现有被子六床,褥子三床,三个帐子。比起当年的郭守均还要富裕得多呢。

集体力量改造了自然条件

一亩地要顶几亩用

走进东郭村,人们都会感到这里的地种得真巧妙。茂盛的花生地里,匀称地长着一排排“九月冻”高粱;稠密的豆子地里套种着玉米;地边地头镶着芝麻或种有花椒树。

当前,正是其他队翻地准备播麦的季节。但是,东郭大队的田野上仍然是片片葱绿。小麦播在哪块地上呢?原来,他们在种马铃薯、大头菜和萝卜的地里给小麦留下了地方。间作套种,这是东郭大队提高粮、菜产量的一个重要方法。

东郭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七分地。在这样小块的土地上,在二百四十五天的无霜期中,如何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郭守明和老农郭守标就想用粮菜套种的办法来种大田。他们的这个理想,在过去缺肥、缺水、缺劳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实现的。

1956年,有了高级社,支部召集老农和干部座谈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人认为,种的作物多了,费工费本,不合算;也有人怕地歇不过来,不能多收。这时郭守标说了话:只要扣好节气,水肥充足,再加上精心侍弄,多种就能多收。他介绍自己过去在半亩沙窝地里用马铃薯间作晚谷,收了晚谷种萝卜,一年三收的经

驗，結果比單作多收了一百五十斤谷子。郭守標是有名的老把式，他說服了大家。改變耕作制度不是件小事，郭守明和郭守標先種了兩畝試驗田。第一年進行三作兩收的試驗：甘薯間作馬鈴薯，收了甘薯種麥，結果每畝收了一千斤馬鈴薯、兩千斤甘薯，比一年兩作一收增產23%。第二年，他們進一步試驗四作三收，馬鈴薯間作玉米，收了玉米種大頭菜，大頭菜地里套小麥，結果糧菜雙豐收。1958年，間作套種的經驗在全隊推廣，土地的利用率成倍增加了。1960年，在幾年來改革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進間作技術。他們發動全體社員討論間作套種經驗，提出“一畝要頂幾畝用”，社員們都把自己過去種過的地土質地性給隊里介紹，提出建議，全隊根據土質優劣，茬口安排，統一規劃，在最肥的地里安排了五作四收：清明種南瓜，南瓜地套蘿卜，蘿卜溝里套玉米，立秋收了玉米拔了南瓜秧，種馬鈴薯，霜降後收馬鈴薯再種小麥。並按土質把間種花生的茬口調到沙質地里，間種小麥的茬口套在硬土地里，糧、油料、菜因地種植，各得其所。間作套種的面積1960年為一千三百畝，1961年為一千六百多畝。老農們說，“地越種越活了。”

低產田的改造

間作套種不單純是茬口安排問題，必須創造水、土、肥等各種條件，這是耕作制度改革的基礎。

舊社會給東郭村農民留下的一片瘠土薄地，凸凸凹凹，既不存水，又不蓄肥，人們稱它是“土龍崗”；長年種植的作物品種退化了，一般保收的年景，也只是兩年三收，畝產量只有一百五六十斤。

當初級社成立之後，黨支部提出了利用冬閑季節改造這塊“土龍崗”。有些人沒有信心，他們搖著頭說：“這能辦得到嗎？會不會白搭力氣？”支部書記郭守明（1956年當選山東省農業勞

动模范)先领着社員在庄东头两亩地里,挖出了一米厚的黃沙,換上了土。他們还在这块地里挖出一口古井。改了土,又有了水,当年种上西瓜;收了西瓜又种上馬鈴薯,每亩馬鈴薯收了二千多斤。

东郭村还有二百多亩“老癩地”,人們划开地皮一看,原来是这种土粘性太大,不含水,庄稼的根伸展不开。他們就把这“老癩土”运到沙地里;把沙換到粘土地里。一年、两年、三年,人們就这样不断地搬运,群众說这是“蚂蚁搬土”。一鏟一鍬,一筐一籃,终于在1958年把全村一千一百多亩“龙崗”沙地和二百多亩“老癩”粘土地改造过来了。

地下水的利用

这里最怕天旱。在改良土壤时,也挖了一些土井,可是井浅水少,遇到天旱,水很快就車干了。1955年秋天,庄稼旱得低了头,社員們心急如火。郭守明这时想起了他曾见过的“洞子井”。他想:咱这里打双眼井也許能行。他领着几个社員到一眼老井旁边,挖了一眼新井,又将两眼井从井底挖通,用老井浇地时就掏新井,用新井浇地时就掏老井,这样輪換使用,水量充足了。这一年一气打了二十三个双套井,第一次取得了合作化后抗旱的胜利。

但是,对一千多亩大田來說,二十三个双套井是不够用的。1956年全村成立了高級社,决定利用冬、春农闲打井。在西坡确定打井地点时,社員郭普志說:“龙崗地上哪来的水!”他听老人們說过,从馬鞍山上下来一条龙崗,龙头伸到西北陈家林村,而东郭村的西坡正在龙腰上,千百年来誰也不敢在这里取水。支部的同志們听了笑着說:“如今是人騎龙的年月!”可是大家动手挖第一眼井时,真是越往下挖,好象水越往下沉,結果也沒有挖成。在散工回家的路上,遇見了老农孔昭营,大家向他請教。孔昭营說:“你們根本沒有找到井眼,哪能打出水?”在老人指点的地方,果真

打出了水来，郭守明意識到依靠群众才好办事。他召集了十八位上年紀的老人，組成打井指揮班，專門領着年輕人打井。這一年，全村打了一百八十三眼井，眼眼打得准，每口井的水都很充足。

1958年，支部派人到外地學來了打機井的技術。青年們聽說要打機井，都爭着到機井隊去干活。可也有些人不大相信機器能抽水澆地。第一眼機井打成了，安上了抽水機。四周站滿了人，要看個希奇。柴油機開動了，象碗口大的水柱冒了出來，通過渠道，流向大田。原來不大相信機器的老人孔昭卓連連地說：“我服氣，一百個服氣！”從此，東郭村組織了一個專業組，年年打機井，依靠自己的技術，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全村共打機井十二眼。現在正在準備再打五眼新機井。

有人問：“你們搞了這麼多水利建設，得到了國家多少貸款？這筆錢還清了沒有？”他們回答說，國家對東郭大隊在1959年有少量貸款，早已還清。大隊現在存在銀行的錢還有三萬七千多元。

肥料的來源

治水改土，還需要充足的肥料。現在化肥有限，主要還靠土肥，大隊制訂合理的積肥報酬，堅持集體積肥與分散積肥相結合、常年積肥和季節性積肥相結合的方法。為了扶持社員多養豬積好肥，大隊着重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鼓勵社員養豬積肥，廉價售給社員仔豬；1962年這個隊大多數戶都養有母豬，做到了自繁自養，並有大批仔豬供應外地。二、按人口供應養豬飼料，每人每年分給養豬飼料糧五十斤，每增加一頭仔豬，補助飼料糧五斤。三、農閑季節抽一部分勞力幫助社員修建豬圈，推墊栏土。

在集體積肥方面，主要是實行“四定（定質、定量、定時間、定報酬）一獎（超額或肥效特好給予獎勵）”責任制。此外，全大隊在田間設立了十二個大型的洋灰積肥池，二十二個漚綠肥池，這些肥池固定專人管理。全大隊每畝施肥量，從1956年的四千五百斤

逐年增长到 1961 年的一万斤。现在数量是够了,也正在进一步提高质量。

試驗田的作用

东郭大队耕作技术的改革,試驗田起了很大作用。六十亩試驗田,是干部领导和老农經驗的結晶,也是全队增产的實驗基地。党支部每討論出一个新“点子”,就同老农、技术員商量,先在这里試驗再推广。从 1956 年起,六年来,这个試驗田研究總結出二十一项作物的栽培技术,先后試驗了各种作物新品种三十五个,其中推广的有十七个品种。仅小麦就試驗过十三个品种,最后确定“平原 50”、“蚰子麦”两个品种适于当地种植,其余的品种被淘汰了。在选择新品种时,人們总是从各个方面分析它的优缺点。例如多穗高粱产量比一般高粱高,但是秸秆矮小,不能滿足社員烧柴盖房的需要,所以沒有全面推广。1961 年,試驗田試种的“九月冻”高粱,产量高,秸秆高,而且茬口晚,可以在茬前搶种一季金瓜,这种高粱已經开始推广。

东郭大队的干部很注意学习外地經驗,總結本地經驗。郭守明每到省里和外地开劳动模范會議,十分注意打听別处增产經驗,什么品种好,帶回种子,在試驗田里反复試驗。种多穗高粱,蚰子麦,几尺长的大豆角,都是 from 外地学来的。歪脖高粱的种子是从省科学院要来的,“平原 50 麦”是从曲阜农場换来的。有一次,郭守明到曲阜去赶集,农場一块特別茂盛的小麦,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隔些时候就来看看,一直到成熟,就立刻来换了种子。他們还計劃研究縮短大豆生长期的办法。郭守明常说,人是活的,地是死的,一把好庄稼手就靠一股“钻”劲。

集体生产发挥了劳动潜力

分工合作 各尽其能

这个大队地少人多，但他们善于运用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因人派活，分工合作，他们说“有人就有粮”，“有劳力就有活干”。全大队种粮的、种菜的、打铁的，各负其责，各尽其能。精通农活十八般武艺的老农郭守标，分配在试验田为全队试验改良作物品种；一支腿残废了的刘海洋手艺好，队里就分配他担任了农具修配工作；姑娘们心细手巧，多分派除虫、管菜等细活；老人则担任看鸡、拾粪。社员们说：“我们村里没闲人！”

当前正在秋收，主要农活有收秋，翻地瓜秧，拔豆地草，胡萝卜地攘土定苗，栽白菜、大头菜等。按照一般包工的办法，只要把这些活路安排下去就可以了，但他们有两套安排。一套是当前的，一套是下一段的。他们翻了万年历，1963年是闰四月，春寒春长，农谚“冷收麦，热打油”，季节特点是增收小麦和晚秋作物。大队干部抓住这个特点，计划1963年扩大麦田，多种晚秋，争取小麦增产，并根据这个要求加强种麦准备工作，增加种子、农药、肥料等。

劳力的安排得法。全大队除了一些专业人员以外，分四个生产队，劳动条件大体平衡，一队又分几个作业组，小组固定，地段不固定，各种农活实行包工；办法大体有三种：专业农活固定专人（如饲养牲口），零星活路临时派工，大量的是小段包工。适合个人作的包给个人，适合协作的包给几个人。一般每一个节令为一小段，农忙也有七八天、三五天为一段的。这一段干什么？用多少工？当前抓什么？为下段准备什么？逐段排好，把小段包工和季节的常年的生产结合起来。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三百六十五日，几乎每一段每一天都有安排。

这里间作套种的作物多，技术操作要求高，活路比较复杂。因

此，队干部认为，劳力的統一調配特別重要。他們說，集体經濟之所以比小农經濟优越，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劳力能統一調配，能充分發揮潛力。把一个作业組的劳力过死的固定在較小的地段上，过长阶段的包工，容易限制新的增产因素插进去，使生产力不能充分發揮。当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經驗是，小段包工，灵活运用，坚持定額，按件計工。

坚持定額 多劳多得

东郭大队的干部认为：要搞好集体生产，調动社員积极性，必須按照劳动定額記分。坚持劳动定額就是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

这里各項生产紧张而有秩序。我們問剥玉米豆的女社員怎么記分？回答是：“二十斤一分”；問一个割草的小孩怎样記分？回答是：“四斤一分”。不管干什么活，社員都知道自己干这件活能得多少工分，而且感到記的工公平合理。

这个大队的各項农活都有“定額”。其中分农、牧、鉄、木等六大类共一千七百多項，每一类中又分許多名目。如农业中包括小麦、谷子、豆子等，各种作物从种到收各个工序都有劳动定額，光小麦一种作物就有三十七項定額，每項都有数量质量要求和应得工分的具体規定。队干部說，如同量布的尺子一样，这就是量劳动的尺碼。有了这个尺碼，干什么活記多少分，就能够公平合理，毫不含糊；有了这个尺碼，不用再熬夜評工，不怕吵嘴伤情面，保証同工同酬，也簡便易行。作业組长郭守恩說：“干活沒定額，就象瞎子丢掉拐棍，寸步难行。”

农活质量如何保証？这里的經驗是坚持制度和加强思想教育。这里各項定額都有质量要求，达不到质量要求，就用返工重作或减少工分的办法解决。如前些时榜豆子，第一生产队的郭知德老汉榜得很細致，可是榜的地少；小成等几个小伙子，榜得粗，榜得

快，磅得多。怎么記分呢？按定額規定，決定給老汉多記工分，小伙子們減分；第二天磅地時，小伙子們就講究質量了。每年四次的評獎會上，對農活質量一貫好的社員給予口頭表揚或物質獎勵。四年級學生郭秀敏給隊里割的草，每次總把土打淨以後才過秤，因此受到隊干部的多次表揚。

東郭大隊自從1956年以來，堅持實行定額，幾年來不斷修訂。現在，90%以上的農活都有定額，好像一本字典，一查就明白。有些農活年年作，不用查也能掌握。定額一年修訂一次，執行中條件有變化隨時修訂。定額的規定，一般都經過試工和社員討論，主要是按農活輕重、技術高低、農忙農閑，分等定分；活重的、技術高的、農忙季節定得高些；誰作什麼活，就得什麼分；適合個人作的就包給個人，按件計工；適合幾個人作的，就幾個人承包，大包小評。六年來，逐步修訂，越改越合理，使集體勞動中的每件農活都有合理報酬標準。

合理分配 促進生產

東郭大隊的干部談他們的領導經驗時這樣說：組織幾百人集體勞動，好比帶領一團兵，可和帶兵又不同，不光要了解地性（自然特點）、天性（氣候特點），特別還要了解人性（人的思想），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增產。支部書記郭守明說：“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好比人愛睡熱炕頭，哪頭熱他睡哪頭，要吸引農民愛集體，一定要聯系他切身的利益，照顧周到，分配合理。”

在東郭村，秋收分配正在開始，我們幾乎每天都聽到分東西。據說，從現在起分這分那，一直分到過年。大隊有意識地抓分配來鼓舞社員，社員從分配中看到勞動的收穫，干劲會更大。

據我們的觀察，東郭大隊社員干劲大，勞動效率高，除上述一些原因外，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对社員生活照顧周到。日常生活，柴米油菜，連婦女們納鞋底的麻，炒菜用的調料葱姜等，都安排得